

收费时雷厉风行,免费时比登天还难

社会热点

曹林

“高速路节日免费”的政策早出台了,国庆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能享受到“高速免费”的假期,可因为地方政府和路桥公司的抵制,这一眼看就快到嘴的节日福利,又生变数。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大多数省份尚未明确出台机场高速是否免费等相关细节措施,都在观望,同时,部分路桥公司抵触情绪依旧。各地找各种理由拖延出台细则,有的称没有参考借鉴模式,有的称“各地区具体情况差异较大,因此细则制定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一言以蔽之:收费惯了,不想免费,嘴里的肉不想吐出来。这种对“高速免费”的观望、拖延、推诿与抵制,是意料之中的态度,是已经被收费惯坏了的地方政府和公司

必然有的反应。只是没想到在中央的政令下,既得利益集团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抵触。以往虽然也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象,但起码会把表面文章做得很漂亮,阳奉阴违,表面支持暗中抵制。比如,交通部门出台了一个《关于做好今年国庆节长假期间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地方起码会在表面上出台一个《关于转发〈关于做好今年国庆节长假期间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做出贯彻执行的态度。可地方政府在“高速免费”上一直拖着不出台执行细则,足见这一次遇到了多大的利益阻力。

收费时雷厉风行,免费时比登天还难,这种现象在“高速免费”上再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且地方政府和路桥公司演的这出双簧戏,配合得非常完美,互相把对方作为借口,把政令当皮球踢。地方政府称要尊重利益相关者路桥公司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声音后再作细则安排,比如浙江的交通、公路、物价、高速交警等相关部门在8月就与该省交

集团及部分高速公路业主举行过座谈会,讨论制定实施细则,但截至目前该省实施细则仍没有出台——他们会以路桥公司的阻力作借口,拒不出台细则。

而路桥公司找的借口则是:虽然国务院出台了文件,具体还是要看省市如何操作,因此我们更关注各自所在省份的细则措施——言下之意无非是说,我们不听国务院的文件,只看省市的细则措施。可是,省市政府部门又以“路桥公司作借口”不出台细则,于是“高速免费”就在这种推诿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公司和政府合演着双簧戏耍着中央和舆论。

路桥公司的阻力,可以想象,可地方政府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抵触,颇让人费解。其实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也是公路收费利益链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政府通过“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将修公路的责任推给市场推给车主之后,就被路桥公司绑架了。出让路权,钱被政府拿走了;收费还贷,公路成了地方政府的取款机;不少地方,路桥公司跟政府部门有着非

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一体的,官商相连,官商勾结,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当地方政府被公路收费的利益绑架的时候,难免不成为抵制免费的急先锋。

收费的时候从来都是急吼吼的,而免费的时候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要开征某项费用时,可能会象征性地举办个听证会,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走个过场,无论听证结果如何,不会阻止收费政策和细则的迅速出台。可是,免费时就麻烦多了。还是以浙江为例,据浙江媒体报道,该省是较早讨论如何将方案相关规定明确化、具体化的省份之一。但至今仍未出台——什么时候收费时,有过这样的“虚心听取民意”,又在听证后“迟迟不出台”的?双重标准、两副面孔,由此可见一斑。一些地方政府,跟公司和商人走得太近,而离公众太远,被公司和商人绑架,甚至政府部门本身被公司化了。

另一借口是“免费并非想象那么简单,涉及道路养护、人员安排、部门协调等诸多问题”。拿技术当挡箭牌,

也是一个万能的借口,可是一些地方收费时,从来没有遇到过技术难题,从来没说过“首次执行免费政策,对许多省市来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一谈到收费,就开着快艇过河了,一谈到免费,就要假装摸石头了。

其实,这一次交通部出台“高速免费”政策,是充分考虑到了地方利益的,比如明确规定:各地不得擅自扩大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车辆的范围,避免各地免费车辆范围不一致而引发新的矛盾——非常体贴地方,担心有些地方走得过快形成攀比,让后进的地方承受不了,所以要齐头并进。还规定:机场高速是否免费由地方决定——这也是一种妥协和让步。可面对这种让步,一些地方得寸进尺。

请容易送神难,收费容易,免费难,“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惯坏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公司,养了地方政府对收费的倚赖,甚至养出了一群蛀虫。现在想让他们切割一点儿收费利益,吐一点儿出来,仿佛要了他们的命。

读懂“北京人大学”的嘲讽与期待

王石川

河南“90后”小伙程帅帅计划给北大送匾“北京人大学”(意指北大招录本地学生过多,成为“北京人的大学”),被警方带走。记者事后联系上了程帅帅,他说他已经安全到家。程帅帅称,9月10日上午,警方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名,将他在海淀派出所扣留了近8小时。

把北京大学称为“北京人大学”,是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修辞学说法,并不是说就读北大的皆是北京人,而是指北大招录的北京籍学生过多,几乎成为了北京人大学。很显然,这是一种公民的合法表达,这种表达并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警方不应该扣留,也不应该把其遣送回河南新蔡。

与其遣送新蔡,不如探讨程帅帅为何要给北大送匾“北京人大学”,以及追问“北京人大学”的说法有没有合理之处?前不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研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换个角度理解,北大对广东、安徽考生设置的门槛比北京考生整整高了100倍。

很显然,北大是北京人的北大确实有点夸张,但北京考生考上北京的机会比其他地方考生的机会大很多,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程帅帅所说,“我看到学校外的榜单,今年北京文科一本线495分,照这分数我

第一年就能上一本了。”而程帅帅经历了2年复读,只考上三本院校。

北大等名校青睐于北京考生,无疑是招生不公的体现,对其他地方的考生实属不公平。网上有一个故事:一湖北小伙在北京一建筑工地当小工,偶然间和在写字楼的设计师聊,没想到他们竟都是1992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全国一模一样的考题),湖北民工当年考了515落榜了,设计师在北京当年考了497上了建筑工程大学。多年后,命运竟是如此差异!这是杜撰还是确有此事,不得而知,但其所直陈的事实不难在现实中找到原型。这个民工不想荣光地上大学、找到体面的工作吗?谁让你不是北京户籍呢。

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公开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按理说,北大等名校的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应该公开讨论,征求公众意见,应该充分博弈,做到利益平衡,毕竟北大是中国人的北大。

但现实令人失望。而招生指标的背后实际上与户籍制度有关,还牵扯到利益固化的格局,据中国社科院专家曲霏称,目前部属大学招生名额分配主要体现了三方意志:高校、高校所在地政府、教育部。高校所在地政府非常希望部属大学都能成为当地的大学,招收当地学生越多越好。如果不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就很难做到招录公平。

完成学业。

中国平安表示,孩子是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全社会关心和重视。中国平安将继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中国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据悉,中国平安希望小学支教行动自2007年以来,共招募约1,527名爱心人士投身志愿服务工作,帮助约20,982名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美的风景,学会爱和分享。2012年以“专注,为明天”为主题的中国平安希望小学支教行动已陆续在云南、重庆、甘肃、河南、贵州等25个城市的平安希望小学开展。

中国平安开启安全教育第一课

教师节向房山希望小学教职工捐赠1500万保额的保险

2012年9月10日,中国平安“专注,为明天”安全教育第一课走进北京市房山区,在蒲洼乡平安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堂生动的“儿童安全教育”的互动课。中国平安向蒲洼乡平安希望小学捐助了1万元校园维护基金和价值3万元的教学用具以及多媒体教学设备。活动正值教师节,中国平安还为蒲洼乡平安希望小学全体教职工捐赠了总保额将近1500万元的“教职工校方责任险”,为那些在艰苦环境下仍旧热衷于教育事业的教师们提供一份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平安还向学校的16名特困学生捐助了助学善款,务求从硬件与软件、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共同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使孩子们能够顺利

画中有话

文/殷国安 图/李宏宇

近日,山东省沾化泊头镇女子张某因在镇政府采摘月季花,被罚款千元。随后另有两名女子在镇政府摘花被罚后向镇政府讨说法,镇政府办公人员认为此事由张某挑唆,将其所在片区水电全停,导致张某经营的店铺已经关门歇业。张某在向镇政府人员解释时,遭到党委副书记刘文合殴打。目前刘文合已被停职检查。

张某摘了一朵月季花,最多是行为不够文明而已,怎么谈得上“破坏公共设施”?这么一件小事应该说一下就算了。可是我们的个别镇干部,却使出了他们治理老百姓的“全套手段”。这样的镇干部,完全不会运用教育的方法、行政的方法解决问题,有的只是行政暴力,把“权力”变成了“暴力”。

应该说,这些干部采取的“罚、掐、打”都是违反法律的。摘一朵月季花就被罚款1000元,

摘花被打



这种“行政处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倒更像是趁机敲一笔;动不动就掐断老百姓的用电,而且把断电株连到了邻居,更是违反《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至于镇党委副书记“亲自打人”,更是直接违反法律,触犯《治安管理处罚

法》了。说这些干部无法无天倒是很确切的。

一些基层干部靠行政暴力做工作,靠“罚、掐、打”治天下,不仅是工作水平、政策水平的问题,而是根本觉悟的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何处,以为自己的职能就是治理老百姓的,甚至为了这样的目的可以无视法律,不择手段。

电话报警有多难

言者有意

严阳

成都的李大爷先是险些被偷,接着发现这一小偷又在准备对另一路人下手,李大爷一直用眼睛瞪着那男子,试图警告对方,没想到对方捡起一砖块朝他冲过来。让李大爷十分寒心的是,在他被打的半个小时里,围观的人们竟袖手旁观。当该男子因涉嫌盗窃被批捕的消息传来时,李大爷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坏人太嚣张了,而且没人帮我。”

这些路人为何袖手旁观?据一

位附近的商户说是因为小偷“很激动,又握有利器”,他们往往是“惯偷,经常在附近行窃,上前帮忙怕他们以后到店里捣乱”。然而,我们可曾想过,正因为其“很激动,又握有利器”,所以,那位见义勇为的李大爷因此可能陷入困境甚至遭遇不测?

常识告诉我们,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从这一点来说,当人们看到小偷手持铁锤一类的利器疯狂追打李大爷的时候,没有人敢站出来予以阻止,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然而,人又该多少有些血性,而一位七旬老人都能做到的事,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做到?退一万步说,我们在此情况之下,至少可以选择电话报警这样相对安全的见义勇为的方式吧?可以,但最终却没有,又是因

为什么?是我们太过成熟了,还是我们太过冷漠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今天很多人的人生哲学。但是,我们可知,当我们碰上这类事件总是选择回避与退让的时候,事实上可能让同类事件更为频繁地发生:为什么这个地区偷盗事件频发,小偷十分猖獗?还不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小偷们知道在这里行窃非常安全!当李大爷们见义勇为却总是难以得到周围人们的鼎力相助,甚至仅仅是一个报警电话的支持的时候,不仅可能让他们身陷困境,而且可能因此挫伤他们的热情,让他们从此同样变得冷漠,让我们生存环境更加恶化。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吗?